

我到中国曲协工作以来

■罗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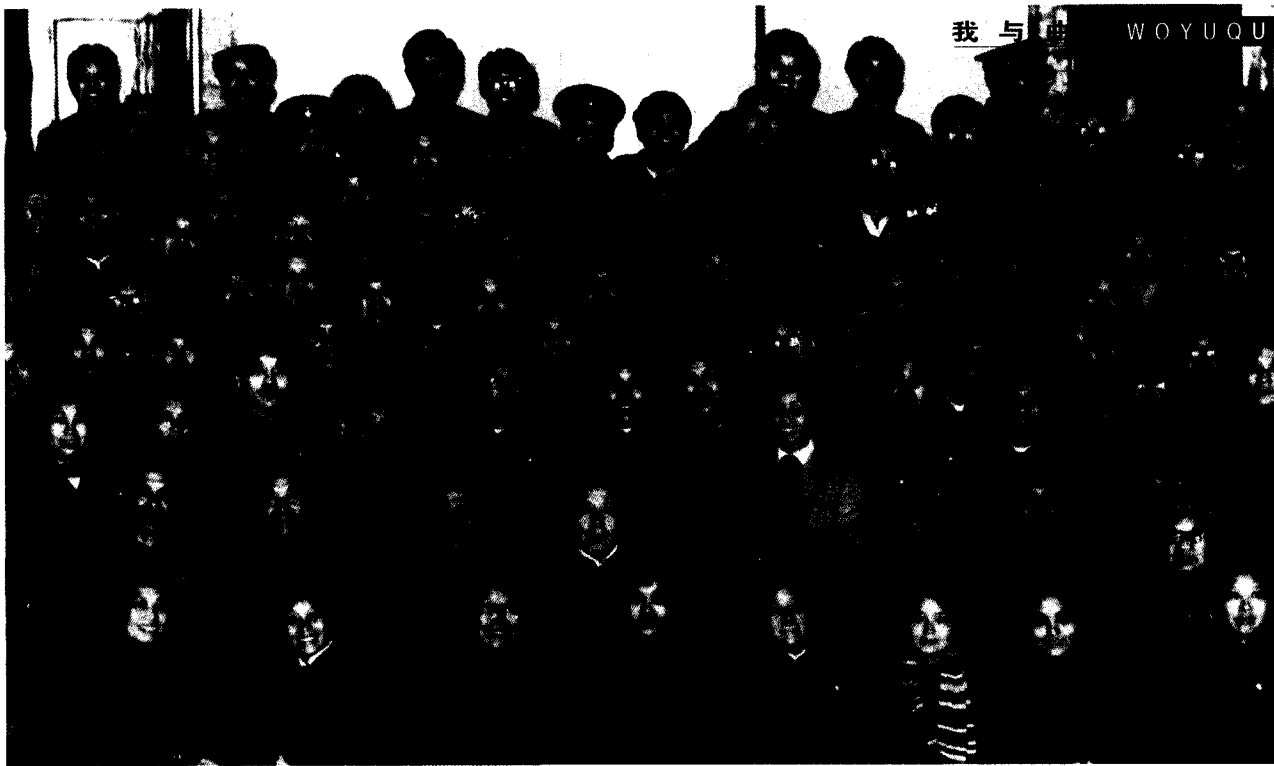
七、中国曲协恢复工作

我于一九七八年六月担任中国曲协恢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之后，因继续主持中国京剧院的工作，每周只能抽出一两个半天与陶钝等同志一起研究协会恢复事宜或办理协会的一些事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文联和各协会均被视为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属于撤销单位，全部工作人员被停止工作，到“五七”干校劳动，文联和各协会办公楼归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占用。文联和各协会恢复工作，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的确困难重重。

最急迫的事情，是找办公的地方，搭工作班子。那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搬不出来，中央和北京市大多数部门已经恢复工作，没有空房可以借用，文联和各协会只好自想办法、自找门路：文联、作协在文化部院内搭起木板房办公；剧协挤进东四八条与较早复刊的《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人民美术》等刊物编辑部一起办公；美协、影协、民研会等单位到有关单位办公；作协在东四头条原文化部大院搭起木板房办公；曲协在前海西街中国艺术研究院内搭起两座木板房，又向艺术研究院借了两间房，作为协会办公用，在东四八条挤出三间房供《曲艺》编辑部办公。尽管费了许多周折，总算有了临时办公的地方。随着人员的增加，文联和各协会办公用房越来越挤，大家迫切希望尽快解决永久性的办公用房问题；有关部门也曾考虑过将复兴门外大街海洋大楼拨给文联和各协会，但由于文联和各协会负责人意见不一，想找更合适的地点盖办公大楼，以致办公用房问题一拖再拖。曲协的大部分同志都挤在木板房办公，夏天闷热难耐；冬天升上煤炉，还是很冷。没有食堂，也没有做饭的地方，大家每天上班时都自带午饭，或到附近的小饭馆里吃点东西。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很差，好在大家都经过“五七”干校生活的锻炼，也不叫苦。

搭工作班子更费周折。最初，只有组长陶钝同志是专职人员。我先是兼任协会恢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七九年初才离开文化部，回到协会工作。许光远、鲁平同志也是先兼任领导小组成员，后从中国艺术研究院调回协会工作的。这样，领导班子才算充实起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先调来的是张茹霞、林治政、程玉琴和赵天民同志，做些具体工作，接着与有关单位协商，陆续将原在协会工作的沈彭年、丁素、郝潭封、冯不异、章辉、孙玉奎等同志调回协会工作，同时，抓紧选调一些适合做协会工作的人员。由于各地缺乏曲艺工作机构和培养曲艺人才的院校，选调专业人员十分困难，发现适合做协会工作的干部，或单位不放，或本人不愿意来；也有些干部被推荐给协会，但适合协会工作的很少；外地干部进京，缺少进京指标。而随着工作的需要，又必须增加工作人员。经过多方努力，才调进一批干部，如张震、李万民、李正忠、彭高瑞、戴宏森、刚鉴、李岳南、刘淑一、陈阵等同志；并吸收了一些年轻工作人员，如王丹蕾、安保勇、黄箭、卢昌五、章笑明等同志。至一九七九年第二次曲代会前夕，协会工作人员增至近三十人；协会办公室、组联部、研究部、编辑部及资料室逐步恢复起来。在党的基本路线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方针指引下，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加强文艺团体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协会恢复工作也迅速开展起来。有些事情，我至今难忘。

迎春茶话会。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首都曲艺界、文艺界人士和上海、浙江来京演出的同志马彦祥、马增芬、王亚平、王朝闻、白凤鸣、冯光泗、关学曾、刘洪滨、刘学智、吕骥、许觉民、杜澎、严文井、李和曾、沈彭年、良小楼、张庚、罗扬、阿甲、金紫光、周柏春、侯宝林、胡絮青、胡青坡、赵寻、施振眉、姚慕双、袁一灵、贾芝、徐肖冰、高元钧、高凤山、常宝华、曹宝禄、魏伯、魏喜奎等二百多人应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曲艺界代表合影（1979年）。

邀出席。茶话会原定在上午九时开始，大多数同志八点多钟就来到会场。大家久别重逢，百感交集，都有说不完的话。批判林彪、“四人帮”，畅谈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奋斗目标，成为茶话会的突出话题。周扬同志来到会场，走向同志们中间，同大家亲切握手，祝贺春节。他即席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曲艺界在粉碎“四人帮”后做出的成绩，希望曲艺工作者再接再厉，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艺术，为人民鼓气，不要给人民泄气；要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时代；要抵制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作风；要把好传统继承下来，又要大胆改革，大胆创新。周巍峙同志代表文化部向曲艺界表示祝贺。他说，曲艺团、队受林彪、“四人帮”摧残最厉害，曲艺队伍经受了考验，证明是一支好的队伍；曲艺是一门群众性很强的艺术，各级文化领导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把曲艺工作搞上去，很好地发挥曲艺的战斗作用。曹禺代表戏剧界向曲艺界祝贺新春。他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曲艺界很活跃，擅长讽刺的相声发挥了战斗的作用。他希望曲艺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侯宝林、高元钧等曲艺界人士纷纷表示，我们一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与文艺界的同志们一起，为改革和发展曲艺艺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做出不懈努力。侯宝林、高元钧、马增芬、魏喜奎、韩德福、姚慕双、周柏春、袁一灵、周剑英等同志还演出了

精彩的曲艺节目。茶话会充满喜庆、热烈和团结奋进的气氛，预示着曲艺界和文艺界有关人士更加紧密地握手合作，尽快医治好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把我国的曲艺事业推向新阶段。茶话会由陶钝同志主持，这是曲艺恢复工作后举行的第一次重要活动。

《曲艺》杂志复刊。曲协恢复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即抓紧进行《曲艺》杂志的恢复工作，由陶钝任社长，罗扬任主编，至一九七八年十月筹备就绪，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曲艺》月刊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复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等文化出版部门的负责人都给予积极支持。编辑部同心协力，精心计划、组织和编选、加工稿件，设计版面，发表的作品、文章和图片都力求与当前的形势、任务相结合，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曲艺特色。陈云同志在评弹座谈会上发表的《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和《致吴宗锡的信》以及《评弹座谈会纪要》，对深入揭批“四人帮”，恢复和发展评弹艺术和整个曲艺事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次评弹座谈会，是陈云同志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亲自主持召开的，当时他还未正式恢复工作。会前，陈云同志曾致信文化部，提出召开评弹座谈会的建议，并征求意见；文化部负责人表示非常赞成，并拟派我代表文化部前去聆听陈云同志的指示。遗憾的是，当时我在中国京剧院主持揭批“四人帮”和清查工作，难以离开，改派艺术



中国曲艺家协会扩大会议合影（1979年5月）。

局戏剧处一位同志前去参加。好在周良同志很快就寄来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讲话、通信和座谈会纪要，陶钝和我及编辑部的同志读后，都深受教育和鼓舞，征得陈云同志同意后，在《曲艺》一九七九年一月号（复刊第一期）发表。随后，协会和《曲艺》编辑部召开座谈会，同志们一致表示拥护，在曲艺界和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期《曲艺》杂志印了十万册，还是供不应求。

常务理事会议扩大会议。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北京崇文饭店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协会常务理事、在京理事、协会恢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部分省、直辖市曲协负责人，中国文联、文化部、总政文化部等有关单位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就曲艺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讲到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及其对曲艺界造成的灾难，无不义愤填膺；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赵树理、王尊三、王少堂等许多为曲艺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表示哀悼。中国文联、文化部负责人阳翰笙、林默涵、周巍峙在讲话中，向与会同志表示亲切慰问，热情地赞扬了曲艺在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阐明了曲艺艺术的特点，论述了曲艺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问题，并对协会工作提出希望和建议。吕驥表示，音乐与曲艺关系密切，音协与曲协要携手合作。陶钝代表曲协恢复工作领导小组作了工作报告。高元钧、侯宝林、王亚平、白凤鸣、骆

玉笙、吴宗锡、施振眉等就曲艺创作和传统曲艺收集整理工作、演唱艺术的改革创新、队伍建设和深入农村等问题分别做了发言。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尽快把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繁荣起来。会议讨论、通过了协会工作计划，并根据协会主席团的提议，任命罗扬为协会秘书长；宣布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此后，我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协会工作中。繁荣曲艺创作，活跃曲艺评论，对于改革和发展曲艺艺术极为重要，这也是协会工作的中心所在。协会恢复工作后，即注意进行曲艺创作情况和曲艺评论情况的调查研究。一九七九年八月，协会在哈尔滨召开曲艺创作座谈会，部分省、直辖市和解放军的曲艺作家、演员和编辑三十多人出席会议，大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重温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恩来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学习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深入讨论了曲艺创作的情况、经验和问题，批判了“四人帮”的种种谬论，统一了认识，提高了信心。会议期间，还展演了粉碎“四人帮”后创作的一些优秀节目。同年，协会为文化部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文艺演出活动推荐了曲艺节目，并组织了多次观摩活动和座谈会。《曲艺》编辑部经常发表优秀曲艺作品和评论文章，并召开多次曲艺创作座谈会，交流创作经验，讨论创作问题。这些措施，对于曲艺界拨乱反正，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方针，促进曲艺创作和评论，繁荣曲艺艺术，起到积极的作用。

复查平反错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精神，对协会所有案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首先推倒了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期强加给一些干部的一切不实之词，为他们恢复名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王尊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王尊三同志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和著名曲艺家，也是中国曲协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正在病中，仍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不幸去世，终年七十六岁。聂荣臻、沈雁冰、周扬、黄镇、王平、傅锺、阳翰笙等同志送了花圈，王平、傅锺、贾庭三、杨士杰、肖民等同志和文艺界、曲艺界知名人士、王尊三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友好二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同志主持，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致悼词，高度评价了王尊三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和新中国成立后所作的突出贡献。不久，中共唐县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为王尊三同志建立了纪念碑。纪念碑耸立在县城附近的山头上，碑名为曾在晋察冀边区战斗过的王平将军题写，汉白玉碑石上镌刻的“人民曲艺家王尊三同志之墓”的金色大字，在苍松翠柏中闪闪发光。我和中国曲协的同志赶到唐县，参加了揭幕仪式，同唐县人民一起表达了对这位老同志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我想，如果王尊三同志有知，也可含笑九泉了。张克夫同志追悼会亦于同年十二月五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张克夫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和文艺工作。一九五八年到中国曲协工作，担任秘书长和《曲艺》杂志副主编。他一贯忠诚于党的事业，工作积极热情、认真细致，为党的新闻事业和文艺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他因患肺结核病动过大手术，身体极为虚弱，到曲协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养病，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仍遭批斗，以至发病去世，年仅四十六岁。沈雁冰、周扬、黄镇、王平、傅锺、张致祥等同志送了花圈，王平、傅锺、张致祥、周巍峙等和文艺界、曲艺界知名人士、张克夫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友好二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陶钝同志主持，我致悼词。回想与张克夫同志相处的日子，历历如在眼前，不尽思念。对其他案件的复

查工作，大都比较顺利，如刘大海同志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以及在肃反、反右中对几位同志所做的不恰当的审查结论，都给以改正。陶钝同志要求恢复一九三一年党籍的问题，经过反复调查研究，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批，也得以解决。只有个别同志的复查工作需由原来做结论的单位负责，未能及时解决。如王亚平同志在肃反中被审查的结论，是北京市文联报中共北京市委审批的，是一重要错案，我们曾多次催促他们抓紧复查，但还是拖到一九八一年才予以平反。再如薛汕同志在肃反中的审查结论，是公安机关所做，本人不服，多次上书申辩。这时他已调离曲协多年，我们及时将他的申辩材料转请有关部门进行复查，但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答复。

筹备全国文代会和曲代会。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各协会代表大会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举行。从春天开始，我就参加了文代会和曲代会的筹备工作。曲协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文代会和曲代会的代表条件、产生办法和代表名额等与各地协商，做好文代会、曲代会代表的推选工作和曲代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最重要也最费力的是两件事，一是写好工作报告，一是协会主席团和理事会成员的建议人选。五月下旬，协会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起草协会工作报告。经集体研究后，先后由沈彭年、王素稔、李正忠同志分别执笔，数易其稿，由于种种原因，大家仍不满意，最后由我执笔，重新改写，经起草小组讨论后，我又做了若干修改，作为送审稿。主席团讨论后，一致表示同意，并决定由我代表协会主席团向曲代会作工作报告。此后，我又做了若干处小的修改。我深深感到，起草工作报告不同于个人写文章，要代表协会主席团把多年来曲艺发展的情况、经验和问题概括进去，并提出今后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提请曲代会审议，的确需要集思广益，认真对待，细加斟酌。关于协会主席团和理事会成员建议人选的考察推荐工作，在中共中央宣传有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经与各地有关宣传文化领导部门和曲艺团体协商，于八月中旬提出具体方案，并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其他准备工作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到九月中旬，曲代会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 李玉）